

UCLA看待世界的方法

2016-03-16 14:19:41

非常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才让我有机会来到UCLA进行学习和体验。让我得以在提升专业知识和素养的同时，对于自身的眼界和思维方式也进行反思。只有当常识受到挑战的时候，才会去思考这些常识是如何被建构的。在UCLA，我修读了三门和研究方法有关的课程。统计、会话分析、历史比较，这三种社会学研究中经典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的产生，本身就是源自于人类对于自身认知方法的反思。统计：当你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世界 统计课的全名叫做Statistical and Computer Methods for Social Research,我本以为在这门课上就算学不到高大上的R,至少也能多多操练Stata,却没有想到教授让我们用的是连助教都嫌弃的SPSS,用助教的话说,“You have to code when you using other software, but for SPSS, you just click, click and click”。然而后来我才发现,教授的本意可能就在于此。老师一开始就强调要培养我们解读统计结果的能力,更强调对于统计结果是否符合真实的反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每周作业除了跑数据做图表,往往还要码上千词来描述这样的结果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是否有意义,是否具有substantive significant。如何对待和解读这些统计的结果,比得出这些结果更重要。细究起来,统计往往是人们在对于世界做出判断时最常用的方法。“越靠近赤道温度越高”,“南方人吃桃子要削皮”,“男生通常比女生高”在做出这些结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大多数”,或者“平均”的情况来作为依据。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反常的例子,比如玉龙雪山的低纬低温,比如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吃脆桃的时候就不削皮,作为一个身高170的女生也经常处于“傲视群雄”的状态。虽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少数情况的忽略,统计依然能够展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对于世界的认识,这也通常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常用的方法。而统计的意义更在于,人们开始意识到单纯凭借个人的认知是无法描述世界的。总有种说法叫“人人都是社会学家”,每个人都可以建构一套适用于世界的运行逻辑,甚至在一生的经历中这样的逻辑从不出错。然而,当我们想要描述一个比自己所接触的世界更大的整体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在自己世界里推出的结论不再适用,我们就需要借助统计来描述更大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统计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检验结果是否能够反映真实情况。要做到这样,第一步就在于抽样。好的抽样可以帮助我们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世界,获得一个能够“代表”我们研究对象的样本来帮助我们得出接近真实的结论。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统计检验,来确定我们的结论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是抽样带来的“随机性”误差。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我们不可能反映完全的“真实”,我们只能尽可能的接近它,到达一个“够用”的地步。所以统计经常以“0.05”的“p值”作为分水岭,我们只能说在95%的情况下,我们有自信说做出的推断是正确的。而当这些结论在应用的时候,人们却往往会忽略这个条件,把通过检验的结果当作“真实”,反而丢失了统计最根本的逻辑。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老师才会降低操作的难度,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统计结果的解读上。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生,我在给出结论的时候是那样的迟疑和小心翼翼。我总是会想,这样的结论真的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吗?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否只是因为我所接触的那个“小小的世界”是以这样的逻辑运行的呢?反思得出结论的依据,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世界,这是统计教会我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会话分析:在琐碎的细节里挖掘准则 说起会话分析,中国的学生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已经走到尽头的学派,细枝末节的分析并不能给我们对于全景的感知作出什么帮助。所以在本科学习的阶段,很少有专门设立课程让学生进行系统的学习,大多是当成一个“过气”学派聊作介绍,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有幸的是,我交流所在的UCLA正是会话分析学派的发源地,创始人加芬克尔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UCLA成为民俗学方法轮的中心。之所以说会话分析是一个走到尽头的学派,是因为其发展已经到了社会学和交流学(Communication)的交叉处,似乎渐渐脱离了社会学的领域。然而Communication作为UCLA的重点专业,往往是学校里优秀学生扎堆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带着敬畏的心态,走进了这个“生机勃勃”的学科。就和在国内上课时介绍的一样,会话分析最重要的预设之一就是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构建”了日常生活中“隐含的行动准则”,而这样的准则,往往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步。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跨越”了太多。在我仍然抱着怀疑态度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会话分析让我渐渐感受到了这点。比如,在日常交往之中,往往存在着“Preference Organization”,也就是所谓的优先结构。要求帮助(request)和提供帮助(offer),拒绝(declination)和接受(acceptance),反对(disagreement)和认同(agreement)等等,人们往往更“喜欢”后者,这就是所谓的优先结构。多做后者而避免前者有助于关系的维持与和谐。而当前者不得不出现的时候,人们会做出很多“巧妙”的行为避免他们。举个例子。在我们不得不做出请求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很多“铺垫”。我们会先说自己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解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最完美的方案是听者在这个时候就明白了意思,直接给出帮助。那么这样一来,人们就不需要做出请求的行为。另一种可能是听者并不能给出这样的帮助(不管是不愿意还是不能够),但是“拒绝”也是需要避免的行动,所以听者往往会通过停顿,放慢语速(显示迟疑),解释自己无法提供帮助的原因等等一系列其他的行为来进行暗示。此时最完美的方案则是,要求者明白这些行为中拒绝的含义,并停止执行请求的行为。这个过程看似十分复杂,然而再仔细回想下,这样的过程竟也是十分自然而然的,我们也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竟然会做出这么多事来维持关系的亲密与和谐。而这也仅仅是我所接触的“海量”例子中的一个典型,会话分析还关注很多其他的话题,甚至有节课就一直在讨论“冷场”的问题,多久算是冷场,冷场意味着什么等等,在我们细究这些日常生活的行为时,我们发现人们的行为竟然是如此“井井有条”,这些隐晦的“准则”默默地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独特性(不同社会的准则往往有着可以感知到的不同),此时再推及到社会的建构就孕育于这个过程之中的结论,似乎又添了一份可信性。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民俗学并不仅仅是“找茬”的“破坏性实验”,它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意义比我想象中的深远的多。在琐碎的材料中整合出内在的逻辑与准则,在准则背后挖掘其之所以是这样的原因,是会话分析教给我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历史比较:我们如何理解真实 历史比较的课程名是Compared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这是我在这里收获最多却也是最艰难的一门课程。在课上我们讨论了五个看上去“实在”的概念:时间,空间,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些概念似乎是真实存在而无可非议的,通常,这些概念的真实性都有着“科学”的参与,使得这些概念显得更加“真实而客观存在”。比如我们会认为时间和空间与物质运动有着共生共灭的关系,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广延性,我们通过日月升降来标记时间,我们也通过移动距离或是体积来标记空间。这些“实在”似乎和“社会建构”并没有什么关系。又比如,我们会认为种族的不是源自于不同人种在“基因”上的差别,这些天生内在的差别才是导致种族这个分类方式存在的原因。而对于性别来说,亦是如此。男女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有人提出性别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有着社会建构的成分时,会显得非常不可理喻。至于阶级,这个似乎最好理解的概念,其“建构”的成分却也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通过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语境下这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迁,我们慢慢摸索到这些看起来“实在”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社会建构”的成分。为何在某种语境下呈现这样的内涵,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这种内涵的改变更是我们需要讨论的话题。在关注“实在”本身的时候,更关注“真实”是如何产生的,是历史分析教给我的看待世界的方法。有关教育在美国可能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像加州一样拥有异质性如此之高的人口了。当年的淘金热把大洋彼岸的各国冒险者带到这里,虽也经历了不少的苦难,也终究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极大丰富了这个里人种族的构成。走在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肤色不同、外貌不同的同学们来来往往,忽然就会觉得,这样不同的人们在一起“相安无事”的生活,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然而,这样的相安无事背后,却又有着太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就像在我们的开学典礼讲话里所提到的,多元、平等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会说多元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角,汇集更多的想法,然而,更多的情况可能往往是,who cares?在美国平等的问题往往都要追溯到人权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平等的标准又是什么?是相同的结果?还是相同的机会?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的竞争之中该怎么平衡才是所谓的平等公正?男女平权的含义又是否只是局限在男女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力?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并不妨碍我们吃饭睡觉拍照发朋友圈,我们只要兢兢业业的做好“本职工作”,过上不错的生活,似乎也就够了。然而,这些问题却总是需要有人去思考,也总是有人“杞人忧天”地主动去思考这些问题。我所交流的学校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在当地还流传着许多别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ts of Asian”,“University of Chinese, Los Angeles”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所学校最大的特点:亚裔华裔的学生非常多。然而,这些亚裔华裔学生的分布却耐人寻味:理工科的占绝大多数,商科居第二,社会科学和人文的却很少。再细致一些,我在这里修读的三门课程当中,统计课程的华裔比例相较于其他两门也是最多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布迪厄关于习性的描述,出现这些现象很难说是依据天性选择的结果还是社会结构的内化。如果再细究下去,问题就更加复杂。根据San Francisco Public Press今年关于旧金山公立学校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旧金山白人口的比例不低,在公立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比例却也不高。根据2013年的普查结果,在学生年龄段的白人比例预计为28%-30%之

间，然而在公立学校的体系中，白人学生仅占了12.9%。那么这将近一半的白人学生都去了哪儿呢？根据更加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教育等级的提升，白人学生越来越脱离于公立学校的体系。显然，我们不会说这些白人学生都因为成绩太差辍学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去了那些以白人学生为主体的私立学校。尽管种族隔离已被废除了很久，教育上的自我隔离却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在洛杉矶还有另一所与UCLA比肩的学校，USC（南加州大学）。有趣的是，UCLA正是公立学校的代表，而USC则是私立学校的代表。在两所学校的互相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端倪。UCLA的那些别名就是最大的攻击点，亚裔扎堆似乎成了一件很掉价的事。更不用提今年年初的SCA5提案中提议恢复对非裔西语裔的招生优惠，却唯独没有亚裔。作为“少数族裔”的“多数学生”，似乎有了被限制的理由。所幸最后提案被加州众议院驳回了。当然，UCLA的反击也不甘示弱，“You know USC? That’s a private school. You can enter as long as you have money. But you guys must have serious grades. And that’s why we say there are all spoiled children in USC”。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各自的形象跃然纸上。除了公立和私立的学校体系所形成的“隔离”作用外，并不为我们所熟悉的兄弟会和姐妹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中国相似，开学之初的社团招新似乎成了“人以类聚”的第一步。但在这里，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招新更是意味着毕业后有没有在上流社会立足的资本。对兄弟会和姐妹会的认识产生于交流之前选的一门英语课“影视与英美文化概论”。其中的一部电影Sydney White让我对Greek Life产生了不怎么好的刻板印象，而其招新标准中对于“精英二代”身份的强调、对于非白人族裔的排斥让我直接把其看作是“精英复制”的主要机制。尽管在UCLA我并没有涉足，从一起交流的同学描述她室友想要进入姐妹会的努力来看，至少这样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和国内一些明星社团十分相似，锻炼能力，结交朋友，积累社会资本，等等。那么问题回到最初，什么是多元，什么又是平等？所谓教育平等，从强调结果平等到强调机会平等，却也走上了越来越难操作化的道路。在遇到这些和常识所悖的看法时，以前的我总是会急着反驳或不甘愿地接受。然而，有的时候这样的“不同”往往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所造成的，站在不同的视角来看，似乎不同的看法都有其成立的道理。无论是反驳还是接受，理解对方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步，然而却往往被人忽略。再一次衷心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让我得以学习到了这么多学业内学业外的知识，开拓眼界，也更让我深刻体会到君子是如何“和而不同”的。而我也会将这些学习成果带回母校，带回同学老师之中，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将西方学术文化带回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之中。